

现代资本主义

第一卷

〔德〕伟·桑巴特著

李季译

商务印书馆

現代資本主義

第一卷

〔德〕伟·桑巴特著

李季譯

商務印書館

现代资本主义

第一卷

伟·桑巴特著 李季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四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4017·3

1936年8月初版

1956年10月重印第1版

1963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20 插页4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17千字

印数 2501—3500册

定价 (9)3.20元

出版說明

本书作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早年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倾向,晚年则公开拥护法西斯。

桑巴特的著作,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奢侈与资本主义》、《三种政治经济学》、《德国社会主义》、《哲学的人类学》等。《现代资本主义》(共三卷)是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初版发表于1902年,1916年和1928年作过两次修订。中译本系根据第三版译出,前两卷在解放前曾由本馆出版。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从法兰克王国迦馬林王朝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止的整个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者在书中用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经济意识,经济意识决定每个时代的经济方式,而技术和政治制度则是经济意识自我实现的条件。从这里出发,他尽力吹嘘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精神,说什么资本主义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创举,是由所谓企业家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引起的,而资本主义精神又是“进取心”和爱劳动、节俭、恪守信用等“美德”所组成的。他把薩伊的生产三要素論改头换面地搬过来,说什么总收入的創造是由于企业主、资本和工人共同参加生产的结果,用以掩盖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剝削。在本书中,他还力图用向馬克思主义献媚的方法来閹割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他一方面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他又大力宣传这种矛

盾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求得解决，实际上否定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学說。在价值学說方面，他在表面上捍卫馬克思的理論，而在他的解释中又把价值变成了沒有任何确定內容的范畴。

桑巴特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荒謬和反动的，但是桑巴特的經濟理論对于德国庸俗政治經濟学的发展曾經发生一定的影响，同时，本书收集的許多历史材料也有助于我們研究欧洲經濟发展的历史，因此我們把这本书重印出版，供学术界研究参考之用。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58年10月

第二版序言

我于 15 年前刊布“現代資本主义”兩卷，現在又值再版，然就目录一看，也知道這是一种完全新的著作。原書的材料重新採用的，追不及十分之一，并且這十分之一也大都是在完全新的思想組織中排列出來的。

我所以保持原來的書名（我本不大喜歡這書名），實因要借此表現本書所認定的任務而加以討論的根本問題，仍和從前一樣；即一個根本問題及其所連帶的一批基本思想。此外，新版在內容上也是一種新著作，凡讀此書的人看過第一章，已經可以發覺出來。

關於本書在新的形態中所擔負的任務，我在序言中不加說明；因為一卷三章第三項已經表現過了。在另一方面，我在本書開卷之前，願對讀者說明兩事：即新版比舊版所表現的重要差異之點，和我依照本書科學的特質對它所取的立場，換句話來說，後面這一點就是我在本書中考察一切事物所取的觀點。

* * *

第二版和第一版的差異點主要的如下：

一、新版在材料上擴充的很多。第一版對於歷史的發展只有片斷的記載，此次新版則力求表現歐洲各民族整個經濟發展的圖形。因此我的描寫現在是從喀羅林時代（Karolingerzeit）開始，一直達到現代，對於早期資本主义的時代，尤其是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特別詳盡，然在第一版中幾乎完全沒有涉及。

我在描寫中對於經濟生活取材特多的國家為意大利、法蘭西、大不列顛、瑞士、尼德蘭、德意志和奧地利，至於西班牙、葡萄牙、斯

干的那維亞和俄罗斯，則很少列入我的观察范围之內。然欧洲各国在亞洲、非洲及美洲的諸殖民地，自然也是談到的。

关于各卷材料的分配也和从前不同。現在的第一卷除掉一种概念上基本的緒論外，所描写的为前資本主义的經濟和現代資本主义的历史基础，而第二卷則为早期資本主义时代的經濟生活，这一卷包罗極宏富，并且是完全重新改作的。以后要刊布的第三卷当描写高度資本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的完成。

二、第二版在構造上比第一版要复杂得多。这不复是一种“临时的升高記号”，而是一种依据严密对位法处理的交响乐，它会引导讀者潛心于更大的工作和更深的造詣。第一卷第二十章是企圖在那頗为复杂的合唱中給予一种透視。这样处置材料的新方法如果的确会被斥为更笨重而不能一眼望得清楚，那它也足以使本書避去一种輕率而沒有思考的批評，这种批評在判断上坚持一个唯一突出之点，而用这是一部“地租論”之类的话来处决全書。

然我最所渴望的，是讀者于研究拙著后，留下一種最深刻的印象，活潑潑地感觉到現代資本主义的起源这句话中包含着極多的問題。自今以后，倘若凡在青草地上建筑的資本主义“發展史”——和革利芝 (Fritz Gerlich) 新近的著作一样——成为不可能，而著名的历史家如柏洛 (U. Below) 对于这些輕率的冒險事業公然許为“一种有用工作的荣誉”一类的事更不可能，那我便特別滿意了。

我以一种自覺的專斷，在近来的著作中对于資本主义發展的一方面加以闡揚，人們却根本否認这种方法；使一些聰明的頭腦为之震动，使一个作者的理解力为人所怀疑，至于这个作者本来今天認城市地租、明天認貴金屬的生产、后天認犹太人、大后天認奢侈、随后又認战争为促成現代資本主义起源的。他們絲毫沒有察出这

里只涉及部分的研究，殊屬奇怪；他們沒有看出我用這種探照燈方法的目的無非在使讀者的視線每次集中於問題的一方面，因此使他在一個時期內必須深刻地去研究這個部分問題。然我現在却把這一切單獨紡成的綫組織起來，並指出參加現代資本主義構造的，不僅是我曾經表彰的諸勢力，並且還有許多種勢力。

三、第二版在方法上尽可能地避去第一版那種也許是最壞的缺點（這裡附帶說一句，一般批評家無論怎樣严厉地批評我，却沒有一人發覺這一點必須加以斥責，只有瑪克斯·韋柏在私人的談話中曾說過多次），即理論的和經驗的寫實的考察方法混合起來，這是不能容許的。這個缺點在描寫手工業中特別顯著，但在其它地方也時常出現，殊令人不快。我現在於討論每一單個問題時，即以分離理論的部分與經驗的部分為主要目標，並在全書中嚴格實行這種兩重的考察，關於這一點，我在緒論第三項中還要詳加解釋的。我對於此項更新極為重視，並且希望在方法論的意義上也能因此推進我們的科學。由此又說到我在序言中要討論的第二點：即本書（及其作者）對國民經濟學的各“趨向”、“學派”或“方法”所取的立場。

現在如果還有人只知道將我們科學的趨向分為“抽象的理論的”和“經驗的歷史的”學派，那沒有辦法，他將和本書對立的。因為他即具有最好的志願，也不能從中指出這兩個“學派”、“趨向”或“方法”之一。然現在遵循新途徑的每種社會科學的著作都是如此。這原不足奇怪，因為自我們看來，“歷史的”和“抽象的”國民經濟學間的對抗已經喪失了一切意義和一切重要性，至少是應當已經喪失一切意義和一切重要性。

現在如果還有一批流於一偏的天才的青年國民經濟學者在我

們的科學中提出一個“理論的”趨向，對着“歷史學派”所代表的研究原則作有意識的對抗，那也不過是由于某種因襲的關係，將“理論”這一概念强行限制在研究完全有定的問題集合體上，這些問題就在保持并發展我們科學中所謂“典型學者”所創立的概念模型，且借助于這種模型去保持并發展那按照孤立的方法所提出的諸現象（更正確的思想諸過程）的“規律性”。

現在沒有一個人對於這種所謂“理論”——特別是抽象而孤立的方法——的價值比本書的作者看得更高。誰肯勞神去研究，便會發見本書中有無數的節段是應用這種方法的：例如他翻閱一卷第三十三章，那正是完全依照此方法作成的。但現在幻想，向來所稱為國民經濟學的經濟生活的社會科學，其本質與內容在此等抽象論和孤立論之中即告枯竭，或者僅認：計劃這樣的構造、得形成此項科學一個獨立考察的部分，我也以為是絕不能允許的。誰相信這樣，那必定稱一個僅計算建築材料載重力等等的人為建築師，其實這種人只是一個部分勞動者。同樣，國民經濟學中僅從事于抽象工作的孤立論者也不過是一個部分勞動者，恰和他的對峙者——僅收集事實的研究者——一樣。只有將這兩種活動聯合起來，才構成科學的國民經濟學整個的成績，現在從我們看來，這完全是自然的；至于“理論”與“經驗”的關係，和同一物的形態與內容一樣，確定這一點，幾乎是很平庸的事。（將第一卷第三十三章和第三十五章對比一下，當特別明了我的意思：第三十三章用孤立的方法，確定貨幣價值與價格間“理論上”存在的“規律性”，而第三十五章則在這個模型中探討一定的歷史時期貴金屬的生產和價格的構成間事實上的關係。）

此外，這種理解已經為早前所謂“歷史”學派的領袖人物所代表；在我們這個世代一切有功于科學的研究者中，它現在也是很流

行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依旧式的划分法被指为或是“理論家”，或是“史学家”；他們恰和后一代一般有才能的代表一样，自然都是“理論家”与“史学家”。本書也正是理論的与历史的。

在我們現代的研究趋向中，“理論的”問題（在其他科学中是如此，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又提在前面，这已經成为此趋向的一个特点；人們直截了当地称为“理論兴趣的复兴”，这是很对的。不过就我們的科学講，不可將“理論”这个名詞限于上面所說那种狹小的意义上。“理論的复兴”对于国民經济学如果是指一种新生命、一种进步，那么，这种进步的代表者的确不是那些毅然高举“抽象的”研究旗帜的意志坚强的人。誰在發展李嘉圖（Ricardo）的公式中（我願再明白說一次，我認此等公式很有用、很有效能，不过总是以知道它的有限的認識价值为前提，尤其要知道，一切抽象論和孤立論只有在依历史特征划分的經济制度的范圍中，才具有一种意义），我郑重地說，誰在研究并發展这种概念模型中看出我們科学的任务，誰就毫無疑义地可以——他如果还具有才能的話——成就有用的工作；不过他不是一个更新者、一个生气勃勃的活动者、一个改革者。毋宁說他是一个模仿者。

人們所称的現代理論的复兴——它和一种哲学的复兴同时出現——完全具有另一种意义。就研究現象的“意义”、研究認識現象的“意义”又較从前为盛一点講，我們的时代是哲学的时代。但就注重概念的分明、材料有系統的处理、尤其是个别知識的綜合又較从前为盛一点講，各个别的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便是理論的。零星研究的結果需要綜合的統一，我在这种需要中真正看出我們現代的特征。

繼續增加的材料压在我們的胸口，使自己覺得这种重負是一种終久不能担負的压力，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便力求从它解脫出

来。但我们如果不愿离开一切“科学”，逃“到遥远的地方去”，除掉给予死的材料以生命，借助于有秩序有系统的范畴，使之灵活，让我们争取变成它的主人外，别无它法可以达到目的。我也愿本书能够被视为这样一种精神解放的企图，因此以特别的兴趣来注意概念的构成与系统的构成，由它们的帮助来自由处置许多世代勤勉收集的材料，并使之灵活起来。

在本书(以及相类似、同性质的书)中所表现的科学、仍旧为“国民经济学”，还是宁可称为经济社会学(Wirtschaftssoziologie)，或类似的东西，这种争论是无聊的，因为它是一种空言的争论。正确说起来，此项科学略异于50年前曼徹斯特学派(Manchesterschule)的代表所称为国民经済学的东西，即那种不受历史的或哲学的重负压迫的学科，为着日常状况去处理日常经济问题(大半是商业问题)，即那种常识的学说，那种从市场去处理市场、由实践去应付实践的“科学”，那种营业学说，又可称为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済学。我现在绝不是要使这样一种日常市场学科极有用的东西陷入疑惑之中。我用坚决的心情所力争的只是：现在这里竟是人类的经济科学。那种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済学只是在经济学的广大范围中，对着数目愈变愈多的技术学说增加一种技术学说。此外，这种以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这只有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己任的科学变成经济生活的诸科学中一种真正的中心科学。

我们不能承认人们向来所称为国民经済学的科学要被投到它在50年前所达到的地位上去，因为德国的大师——无论是所谓“历史学派”，或所谓社会主义的流派——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工作，他们的主要结果对于我们应作为一种不可丧失的财富。

我的著作不供某个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政策的党派之用，

絲毫用不着郑重声明出来。这是自然的。在近几十年来的德国，人們对于科学代表的区分，也已經开始不以他們的科学方法和成就为根据，而以他們的政治意見为根据，这是現代一种不良的征候，令人想起美国的状况。实际利益的代表这样做，原不算很坏，因為他們这样的人用不着知道科学是什么。但学术界也陷入这种不正当的途徑中，便是最严重的事。我的意思是，只有从屬的和内心不科学的人才能够想到評判一个科学的人物，和对国会的选举一样，要問他的思想是“接近企業家”，还是“接近工人”，如此等等。

* * *

我对于支配本書的諸种意見所标举的倘不完备，也不願用一句話再去表明我对着历史研究和史学家所采取的立場。

在專業的史学家集团內，認本書在第一版的編制为一部拙劣而錯誤的書，这就算是解决一切了。这些史学家在否定的批評上，有一大部分是对的。第一版各处包含一些惡劣的錯誤，必定使他們挾着自己完全凶猛而激烈的方法，加以反对与拒絕，因為他們是習于徹底綿密的方式，并在一个严格的学派中發育出来的。我希望第一版那些缺憾的大部分在第二版中是被删除了。

但我不能承認，一般史学家否定的批評的全部都是对的。他們倘若避去一种滿怀敌意的批評論調，对于事实当較有益，不过我責备許多公开批評我的書的史学家之处，并不在这种論調上。学生要同意保存先生們曾經应用的論調，正是义不容辞。受博士考試的青年学生当作一个經濟史問題的論文时，常在他的小册子中用大段的文字来反对我，并宣言他和我的意見“自然”不願發生絲毫关系，这是某些大学良好的學風，我見了，几乎至为高兴。（然我这些意見对于他草拟論文，常是有用的。）

但这究竟不是十分重要的。較为重要的是，許多史学家又認

我的書中所用的历史表現的方法——即我的方法中的結構論与一般論——为不对。我对于这种見解願以下列的說法为权衡：对历史的世界提出問題，显然有兩種可能性，或是問：曾發生什么事，或是問：曾重演什么事。人們就事件的唯一性看，可称前者为特殊历史的問題，就事件的重演看，可称后者为社会学的問題：总說一句，它們都是对的，一切历史的編纂都可利用这两个提法。按照所考察的对象，得时而注重这一提法，时而注重那一提法。傳記和狀況史將表現最外表的对抗。这两个提法在經濟史中也占有地位。这里也沒有“非此即彼”，只有一个“不仅……并且”。但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在發見特点的特殊理解中，不仅需要一种有用的經濟史作为补充，并且恰恰需要它作为基础，这是必須郑重声明的。一經确定那些經濟現象是一般的，这就是說，重演的，才能够确切宣布我們所考察的問題集合体的特点是在那里。

現在本書的特点就在对于研究經濟諸現象一般性的問題一直扩充到可以达到的最外部的界限。这种界限是由南欧和西欧的民族——他們自民族迁徙以来，就是欧洲历史的代表者——所構成的文化圈。單就这一点来考察，上面的問題又是一个特殊历史的問題：只有一部“現代資本主义”史，沒有一部一般的資本主义史。但在这个曾經确定的文化圈內，各民族的每一特点並沒有顧及，而且要問：那些引导現代資本主义起源的經濟現象是欧洲一切民族所共有的？我不仅認这个提法为完全正确，并且和我曾經說过的一样：發見經濟發展中这些普遍的欧洲的特点，是探討較小的集团經濟的运命而希望取得丰富收获的必要的前提。

我的著作并不排除特殊的研究，它可以涉及整个的国家，也可以涉及單个的乡村：反之，它才使它們产生良好的結果。要在人們知道欧洲經濟史是什么以后，才可以著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等

国的經濟史。一个数学者將各值中重現的字母取出来，放在一个括符的前面，所以他不說 $ab+ac+ad\cdots$ 而說 $a(b+c+d\cdots)$ ，我也应用同样办法，从欧洲一切經濟史中——它們各为欧洲的和国内的特質的产物——找着欧洲的音符，并在它們特殊的形态中去追踪它們。每个史学家在深思熟虑之后，于狹义的历史研究之外，必定承認这种方法。

然他对于另外一点也的确当弄明白：就是解决一个問題——和我曾經提出的一样——必須应用一种科学的器械，不过史学家在解决自己所熟習的問題时，不限定要用它。这种器械就是經濟生活有系統的知識的巧妙圖案。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的理論的深入檢討，才能够發見諸現象中最普遍的联系。只有一个在理論上受过完全鍛煉的、尤其認識現代經濟生活的經濟学者，才能著現代資本主义的起源史。他的确也可以是一个專門的史学家。不过他必須如此，可惜还不是較旧的史学家集团中一种普遍流行的意見。否則不会發生下面一件事，即著名的历史研究家如亨利·皮倫（Henry Pirenne）在全世界專門家的面前（1913年倫敦史学家會議），演講資本主义的發展阶段，竟暴露他对此問題沒有觀念，达到可惊的程度。近几十年来一切劳苦的思想結晶品都在这位学者的面前滑过，不留絲毫形影，他以一个小孩子的天真的态度来对付我們三十年来疲精費神的諸問題。这个类型的經濟史学家必須死絕，否則我們不能前进。在实际上，他已經半屬於过去时代。这可以从各国一些青年經濟史学家的著作中反映出来，此等著作对于我們曾經提出的諸問題，并不是大模大样地置之不理，而是从他們的观点出發，挾着热忱与專門知識，加以攻击。像我这样的著作对于繼起の後代——又在史学家中也是如此——不会是无用的和錯誤的企圖，而是它自己的狹义的經濟史的探討中一种必要的

补充,这是我所抱的确切的信念。

末了,我还須提到一个比較不重要之点:即我的征引的方法,它也为無数批評家所反对(我的書中有什么东西不被反对!)。人們对它所發生的种种疑虑正給予我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簡單称为我的征引的方法。首先关于引用文的分量,一种人說我的征引太多,書中“堆积”“死材料”太多。我回答这些批評家道,我自己不知道曾堆积了“死材料”,并相信我的每种引用文都是活潑潑的。我的一切引用文和讀者看見的一样,几乎都是直接史料引用文,即在取自对象有文学的潤色之处,也是如此。只有在例外的場所,我才征引其他研究者的意見,这并不是由于我看不起此等意見,只因我要尽可能地排除一切爭論于我这样一种著作之外,就我的經驗講,此項爭論是沒有用处的。但我对于那些史料引用文常是大批的征引,如果可能的話,并全用原文,以便所指示的現象得印入讀者的心灵中,所陈述的个别例子得变成他的深刻的体验。我要繼續將实际最动人的圖形表現在讀者的眼前,才能够使極端的一般化不致为人所厭惡。我所殫精竭虑的是在从最內部的特殊中导出最后的普遍狀況。因此我必須發表完全具体的見解,去确定完全普遍的特点。而材料的充实达到一定的高度,更不可少。这就是引用文的分量常是繁多的由来。

另一种人以为我的征引太少;这就是說,这一节或那一节沒有参照这种著作及材料,或那种著作及材料。我对于他們也發生異議,我自己完全知道沒有控制所考查的全部著作。就頗为广大的探討方面講,这也是很难的。所以無論何人如向我指出,我曾在这里或那里忽略了一种重要的史料(以此史料在一个重要点上可以訂正我的探討的結果为前提),那我当感謝他。在另一方面,如果

已經提及 12 种著作，还刺着也許完全不重要的第 13 种著作沒有說到，恰为批評者所知道而加以訾議，我覺得来爭持这一点是很瑣屑的，可是有些批評家，甚至于有名的批評家，都喜欢这样做。此外，在提出問題——这是本書的基础——时，史料引用文的完备也不是强制举証一个必要的条件。

还有些人因我只征引印本的材料，沒有征引抄录本的材料，觉得这是本書的一个弱点。我对他們回答道，我倘若將時間花費在档案的研究中，本書一定不能著成。欧洲經濟史中有許多点至今还很模糊，只有从事于档案的研究，才能够使之明显，这的确是对的。不过現在根据印本的材料已經可以作成一种明白的全部概觀。必須力求先有这种概觀，才能够使后来的研究更有結果。我想，翻閱本書就会証明，徹底研究現今刊印出来的材料，已經使新的启示何等丰富啊。

关于我的征引方法的一点，公然表現許多疑惑，好像我的引用文是由自己直接找出，一定不是从其它著作中借来的。我对于此事的意見是，一种在广大範圍中（在史学家中也是如此，并恰恰如此）所喜用的慣技，是从其他著作家抄出引用文，却不明白說出此項假借，我总觉得这是对精神财产的一种盜取。当人們因他人之力得参考一段材料，本来应当注明出来。但这一点終久不能实行。完全从科学的仪則看，必須要求一事，即人們对于所征引的每一段落，亲自拿原書加以对比（对于不能取得的著作，可由一个学生或一个好友为之对照）。当我草本書时，这个原則也是我所奉为准繩的。

学者集团中蔓延愈广的另一种同样不良的習慣是做著作提要，却没有看过所征引的著作。就我們的圖書目录技术現有的程度講，开出任何長篇的書目，并非难事，然这只能使淺学的人認為

博学多聞，至于精通的專家，書目的起源既受其賜，大都看得出這種剽竊。⁴ 這樣一種不正當的行為應用一種默認的規律去加以防止，就是人們如果不充分知道一部書對一定的目的有何種用途，即不當引入著作提要中。就我的經驗講，著作目錄同時要包含所列著作的一種說明，才對於讀者、特別是對於初學者有用途。因此我曾定下一種計劃，對於每種引用的著作尽可能地附以一種完全簡短的說明，使讀者得略具一點概念，知道其中所討論的是什麼。

有些批評家對於我的書中個別的部分曾加以反對，我以為在本書特別的地方給予一些事實上的解釋，較為適宜。然對於我的思想進程勞神去加以討論的批評家，為數並不多。為着這件事的利益計，我願本書這個第二版出版後，此項人數能夠增加起來。最大多數的批評家不知道是缺乏好意，還是沒有理解力，對於本書絲毫沒有重要的議論。姑假定他們是否認本書。我願他們將老哥德的話作為座右銘，就是：“人們對於批評既不可防守，也不可抵抗；必須加以攻擊，這樣便可使之逐漸沒落。”凡對在科學沒有加以深刻的批評的地方，生命的泉源很少涌現的，凡在精神上活躍的東西，沒有批評能夠予以毀滅，就是最可恨的批評也無能為力，這正是一種足資慰藉的意識。

1916年9月偉·桑巴特序于中部施萊柏浩